

引用本文:徐紫嫣,夏杰长.服务业开放、国民收入追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4(3):68-76.

DOI:10.3876/j.issn.1671-4970.2022.03.009

## 服务业开放、国民收入追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徐紫嫣,夏杰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北京 102488)

**摘要:**从服务业开放视角研究国民收入追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表明:仅从服务业规模维度的开放未必对国民收入追赶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更应该注重开放质量和结构;新兴市场国家的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增加对国民收入追赶指数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新兴市场国家提升高技术服务进出口比重将有利于提高国民收入追赶指数;服务贸易占GDP比重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促进国民收入追赶。因此,我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既要强调扩大服务业开放对国民收入追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积极作用,更要重视优化服务业开放结构和提高服务业开放质量,不断提升服务贸易中高技术服务进出口占比,充分发挥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民收入追赶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服务业开放;国民收入追赶;中等收入陷阱;新兴市场国家;全要素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2)03-0068-09

纵观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产业演变规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和劳动就业占全部就业比重不断上升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中上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普遍达到了75%,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强化了这一趋势<sup>[1]</sup>。经济服务化和服务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是挑战更是机遇。站在全球视角看,中国服务经济发展相对滞后。2009年,世界银行首次公布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4.33%,与沙特及印度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远低于同期德国的64.11%、美国的76.38%和日本的71.53%。即便2021年达到了53.3%,还是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一定差距<sup>[2]</sup>。

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努力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对世界经济格局及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迈向高收入经济体,跻身中上等发达国家行列,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但同时也要正视发展和开放中可能的风险与挑战,深刻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部分国家(地区)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sup>[3]</sup>。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服务业已经是现代产业体系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没有服务业高质量增长和高水平开放,就不可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国民经济的成长和追赶<sup>[4]</sup>。

在世界经济体中,中等收入国家占有很大的比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073139)

**作者简介:**徐紫嫣(1990—),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服务经济与旅游管理研究。E-mail:xuziyan2021@126.com

重。对中等收入国家而言,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是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最通常的路径选择。但是,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从低收入阶段迈向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相对较短,但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则需要较长的时间<sup>[5]</sup>。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在中等收入区间徘徊不前,无法跨进高收入国家阶段,这一现象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sup>①</sup>。本文在借鉴 Woo “追赶指数”研究的基础上<sup>[6]</sup>,利用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1995—2020)对服务业开放和国民收入追赶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就如何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和提高服务业开放水平助力国民收入追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一、文献综述

从目前已有成果看,主要与三方面文献相关:一是研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划分标准的文献;二是研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的文献;三是研究服务业发展、开放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系的文献。

### 1. 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划分标准的研究

人均国民收入(GNI)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世界银行据此把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组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sup>[7]</sup>。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每年都会进行动态调整,每年发布的《数据统计手册》中的标准是以两年前人均 GNI 为标准。比如,2015 年对全球国家和地区经济体发达程度的划分,就是根据 2013 年人均 GNI 来计算的。按照当年美元价格,若人均 GNI 小于 1045 美元,则为低收入经济体;若高于 12 746 美元,则为高收入经济体;处于中间的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由于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各国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因此以绝对收入水平衡量一国收入水平并不准确。基于此,Woo 把 PPP 衡量的一人均 GNI 与美国人均 GNI 的比值定义为收入追赶指数(CUI),从而动态衡量一国收入状况<sup>[6]</sup>。之所以选择与美国人均 GNI 比较,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国家,而且是过去 200 年经济一直持续稳定增长。把 CUI 大于 55% 的国家定义为高收入经济体,小于 20% 的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处于中间的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 2.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的研究

不同发展水平经济体并非一成不变,受资源禀

赋、国内政策、社会稳定和国际环境等因素影响,一些国家会由低(中等)收入迈入中等(高)收入经济体,比如中国等。但也有一些国家可能会从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跌落至较低发展水平,比如拉美的秘鲁、智利、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和东南亚的菲律宾等<sup>[8]</sup>。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的统计发现,1960 年的 101 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在 2008 年只有 13 个迈入高收入经济体。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许多拉美和亚洲国家便已达中等收入发展水平,但始终徘徊不前。1960—2005 年,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债务危机以来拉美国家人均收入与美国人均收入的相对比值处于不断下降状态,经济增长较长时间停滞不前,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sup>[9]</sup>。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原因较多。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张德荣总结为收入差距、需求和产业结构、城市化进程和人口结构等几个方面<sup>[10]</sup>。高杰等从社会建设滞后、转型失败、社会流动性不足、发展模式缺陷和福利赶超等 5 个方面进行了总结<sup>[11]</sup>。赵秋运等认为我国曾经的赶超战略,使得资源要素偏向于工业部门,产业结构被扭曲,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sup>[12]</sup>。郭金兴等实证结果倾向于证实中等收入陷阱是存在的,制度、收入分配、教育和技术创新是决定跨越还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性因素<sup>[13]</sup>。杨高举等认为,发展中国家在低收入阶段可以通过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和技术模仿或模仿创新来获得产品竞争优势,赢得部分国际市场从而提高本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但随着收入不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严格,技术模仿变得比较困难,同时劳动力工资上升使得产品竞争优势丧失,如果不能通过技术创新或不能变革僵化的管理制度,很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sup>[14]</sup>。王效云通过国际比较研究发现,那些中等收入国家要顺利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具备一些特殊条件,比如政局比较稳定、市场竞争充分有序、人力资本素质较高、收入分配制度相对公正公平、对外开放灵活有序等。当然,这只是基本条件,具备了这些条件,可

<sup>①</sup>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最早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并作了相应阐释。这个报告认为,一个国家人均 GDP 长期徘徊在 4000 ~ 12000 美元,却不能突破 12000 美元的关卡,从而无法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这种现象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并不意味着必将跨越,还需要其他一些变量或因素<sup>[15]</sup>。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和变迁,1952—2017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代表性国家是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失败的代表性国家则是阿根廷等拉美国家<sup>[16]</sup>。中国能否像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一样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有可能步阿根廷发展之后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学术界非常关心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议题。

### 3. 服务业发展、开放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姜文辉认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在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重要原因就是大力推动技术创新,致力于发展高技术服务业和扩大服务业开放,以此推动国内产业从资本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实现产业升级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sup>[17]</sup>。张建华等认为,通过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业融合发展和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之举。他们选取45个非石油出口型经济体1950—2010年的数据,刻画世界服务业结构演化的典型事实,构建了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人力资本供给的匹配模型,揭示了服务业对外开放和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视角下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理和跨越条件<sup>[18]</sup>。任皓等认为,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有利于提高高技术产业附加值和促进经济增长,并运用EC3SLS方法,测算结果发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于高技术产业的产出弹性为1.22,尤其是低制造业结构、低收入水平的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于高技术制造业产出弹性更高<sup>[19]</sup>。他们认为,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加快发展和引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从而提升本国产业附加值,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强大动能<sup>[19]</sup>。夏杰长等认为服务贸易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短板,我国服务业开放度和开放水平都亟待提高。为此,加快服务业开放力度,尤其是要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使之成为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最大“红利”、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关键因素和推动中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力量<sup>[20]</sup>。

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对经济体发展阶段划分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研究比较多,在经济体不同发展阶段划分标准和分析落入中等收入原因等方面的研究比较深入,有较大贡献。但从服务业开放视

角,尤其是从服务业开放结构视角来研究国民收入追赶的文献非常少,即便有,也是定性描述居多,实证分析几乎是空白。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阐释了服务业开放,尤其是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对国民收入追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机制;第二,提出劳动生产率在服务业开放对国民收入追赶的影响机制,进一步明确了对高技术服务进出口的重要性;第三,从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出口和进口3个视角刻画服务业开放及其结构,并实证检验服务业开放水平和开放结构与国民收入追赶的关系,从提高服务业开放水平和优化服务业开放结构视角,提出了实现国民收入追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建议。

## 二、作用机制、数据变量和模型设定

### 1. 作用机制

从世界服务贸易发展过程来看,尤其是服务业发达的国家经验显示,一个国家的服务贸易结构合理程度是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与质量的重要体现。提升服务业开放水平必然要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在服务业开放过程中注重对先进技术和产品的引进,根据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理论可知,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自身的资本投入和自主创新水平比较落后,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来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使用国外新的产品和服务,都更为省时省力<sup>[21]</sup>。而且,通过进行有效的学习与模仿,可以更高效率地提高技术应用与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出口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增强国际贸易竞争力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就是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和集聚发展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又可以显著地促进中国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成长和追赶,因此,在优化服务贸易开放结构中也应该增加服务出口中高技术服务贸易的比重<sup>[22]</sup>。通过引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激活企业技术进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促进产业之间要素配置结构的优化,从而提高经济效益与国民收入水平,这正是服务业开放助力国民收入追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机理。

### 2.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利用世界银行WDI数据库(1995—2020),采用跨国数据,根据全球国家和地区的特征,选取了42国家,

其中包含 37 个 OECD 国家以及 17 个新兴市场国家,其中 OECD 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有重合国家。

借鉴 Woo 的“追赶指数”<sup>[6]</sup>刻画一国国民收入追赶,即一国人均 GNI 与美国 GNI 的比值。但与 Woo 不同,本文并不以追赶指数的实际值对选取样本国家进行经济发展水平的划分,而是视其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代法涛使用 GDP 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分析影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但一国向高收入国家的追赶不仅取决于自身经济增长水平而且也取决于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sup>[23]</sup>。因此,使用追赶指数作为收入追赶的代理变量既考虑了经济增长的绝对水平,也考虑了一国和高收入经济体的相对增长水平<sup>[24]</sup>。主要变量统计性描述如表 1 所示。

核心解释变量是服务业开放结构。本文将从整体、出口和进口 3 个视角来刻画服务业开放及其结构。整体方面,选取经济规模中服务贸易占比、贸易规模中服务贸易占比刻画服务开放的整体水平,分别用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计算;出口方面,选取服务出口占贸易总额比重、服务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以及服务出口中信息和通信技术出口的占比;进口方面选取再次选取 3 个指标,分别是服务进口占贸易总额的比重、服务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服务进口中信息和通信技术进口占比。

控制变量主要选择影响一国经济结构、投资等经济变量,包括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外国直接投资、资本形成总额和 GDP 比值、储蓄率,以及通货膨胀率等。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 1。

### 3. 模型设定

使用面板回归模型,估计模型可设定如下:

$$Catch_{it} = \alpha_0 + t + \alpha_1 X_{it} + \alpha_2 Z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中: $Catch_{it}$ 为追赶指数; $X_{it}$ 为服务业开放和结构等核心解释变量; $Z_{it}$ 为投资、资本、通货膨胀率等控制变量; $\alpha_0$ 、 $\alpha_1$ 、 $\alpha_2$ 为待估计参数; $\varepsilon_{it}$ 为扰动项; $i$ 为国家; $t$ 为时间。

回归分析时,把服务业结构和服务业开放分别控制,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进行了综合控制。解决内生性问题时,使用系统 GMM 重估了模型。

## 三、实证结果

### 1. 全样本结果

表 2 为服务业开放与国民收入追赶的整体情况,主要考察了服务贸易占 GDP 比重和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对国民收入追赶的效应。表 2 的回归结果表明,全样本下服务业开放对国民收入追赶呈现显著负向效应,服务贸易占 GDP 比重每增加 1%,国民收入追赶下降 0.136%,贸易总额中服务业占比增加 1%,国民收入追赶下降 0.156%。第(1)、第(2)列采用样本是 1995—2020 年 26 年数据,不同时段有不同的发展特征。基于此,以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为断点,把数据分为 1995—2008 年和 2009—2020 年两个时间段。第(3)~(5)列结果和全时间段内的回归结果一致,服务贸易占 GDP 比重和占贸易总额比重都没有促进国民收入追赶,但是在 2009—2020 年贸易总额总服务贸易占比对国民收入追赶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表 2 的回归结果表

表 1 主要变量统计性描述

单位:%

变量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i>Catch</i>	追赶指数	1074	58.90	28.70	5.48	149.60
<i>SerGdp</i>	服务贸易占 GDP 比重	1059	26.90	38.60	2.06	297.20
<i>SerTrade</i>	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	1059	24.60	13.20	5.27	86.30
<i>ExpTrade</i>	服务出口占贸易总额比重	1059	13.60	8.38	1.99	48.10
<i>ExpExport</i>	服务出口占总出口比重	1059	27.60	17.10	3.92	89.80
<i>ExpHigh</i>	通信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	872	7.20	8.27	0.29	52.10
<i>ImpTrade</i>	服务进口占贸易总额比重	1059	11.00	5.64	3.28	39.00
<i>ImpImport</i>	服务进口占总进口比重	1059	22.20	12.00	6.67	82.20
<i>Fdi</i>	外国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	1043	7.60	28.40	-57.60	449.10
<i>Industry</i>	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1083	26.17	6.77	99.85	48.06
<i>Capital</i>	资本形成总额占 GDP 比重	1092	24.20	5.53	1.16	54.70
<i>Save</i>	总储蓄占 GDP 比重	1044	23.80	7.02	4.66	51.80
<i>ImpHigh</i>	通信计算机等服务占服务进口额的比重	1031	36.40	14.90	2.32	79.80
<i>Inflation</i>	通货膨胀率	1084	5.83	30.05	-9.67	913.20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表 2 服务业开放与国民收入追赶:整体情况

解释变量	全样本		1995—2008 年		2009—2020 年	
	(1)	(2)	(3)	(4)	(5)	(6)
<i>SerGdp</i>	-0.1363 <sup>***</sup> (0.0205)		-0.0942 <sup>***</sup> (0.0232)		-0.1458 <sup>***</sup> (0.0352)	
<i>SerTrade</i>		-0.1564 <sup>***</sup> (0.0269)		-0.0936 <sup>***</sup> (0.0287)		0.1273 <sup>***</sup> (0.0489)
<i>Industry</i>	0.1296 (0.2250)	-0.0920 (0.2340)	0.5207 <sup>**</sup> (0.2598)	0.4605 <sup>*</sup> (0.2616)	-0.2609 (0.2124)	-0.2654 (0.2163)
<i>Capital</i>	0.5495 <sup>***</sup> (0.1300)	0.7268 <sup>***</sup> (0.1301)	1.0232 <sup>***</sup> (0.1456)	1.0371 <sup>***</sup> (0.1464)	0.6097 <sup>***</sup> (0.1329)	0.5810 <sup>***</sup> (0.1359)
<i>Save</i>	1.6795 <sup>***</sup> (0.1445)	1.6428 <sup>***</sup> (0.1452)	0.8502 <sup>***</sup> (0.1596)	0.8169 <sup>***</sup> (0.1601)	0.7815 <sup>***</sup> (0.1528)	0.7647 <sup>***</sup> (0.1546)
<i>Fdi</i>	0.0222 (0.0157)	0.0219 (0.0159)	0.0330 <sup>**</sup> (0.0162)	0.0257 (0.0160)	0.0215 (0.0161)	0.0301 <sup>*</sup> (0.0161)
<i>Inflation</i>	-0.0299 <sup>**</sup> (0.0131)	-0.0308 <sup>**</sup> (0.0132)	0.0029 (0.0098)	0.0019 (0.0099)	0.4087 <sup>***</sup> (0.1450)	0.3624 <sup>**</sup> (0.1461)
常数项	-1.6728 <sup>***</sup> (0.0713)	-1.6062 <sup>***</sup> (0.0689)	-1.6471 <sup>***</sup> (0.0907)	-1.5744 <sup>***</sup> (0.0860)	-1.1147 <sup>***</sup> (0.0786)	-0.6695 <sup>***</sup> (0.0789)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988	988	528	528	460	460
$R^2$	0.5702	0.5653	0.5286	0.5229	0.3455	0.3289
截面数	42	42	42	42	42	42

注:\*\*\*、\*\*、\*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系数估计值的标准误。下同。

明,单纯追求服务贸易总量,并不一定能够促进国民收入追赶。

## 2. 分样本结果

为进一步厘清服务贸易对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国民收入追赶的效应,把样本分为新兴市场国家和老牌发达国家两个子样本。其中,新兴市场国家有 17 个样本,老牌发达国家有 25 个样本。表 3 给出了回归结果,表明经济规模中服务贸易占比和贸易规模中服务贸易占比对老牌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国民收入追赶的效应不同,对新兴市场国家国民收入追赶的效应为正,而对老牌发达国家收入追赶效应为负。表 3 结果表明,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总额中服务贸易占比对国民收入追赶有异质性效应。

表 3 服务业结构与国民收入追赶:分样本情况

解释变量	老牌发达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	
	(1)	(2)	(3)	(4)
<i>SerGdp</i>	-0.0013 (0.0171)		0.0059 (0.0373)	
<i>SerTrade</i>		-0.0599 <sup>***</sup> (0.0213)		0.1334 <sup>**</sup> (0.053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72	572	416	416
$R^2$	0.5156	0.5228	0.7283	0.7329
截面数	25	25	17	17

进一步考察不同时段内贸易总额中服务贸易占比对国民收入追赶的作用,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可见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市场国家中贸易规模中服务贸易占比对国民收入追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表 4 新兴市场国家分时段情况

解释变量	1995—2008 年		2009—2020 年	
	(1)	(2)	(3)	(4)
<i>SerGdp</i>	-0.0233 (0.0421)		-0.0054 (0.0512)	
<i>SerTrade</i>		0.0364 (0.0539)		0.2787 <sup>***</sup> (0.070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29	229	187	187
$R^2$	0.6029	0.6380	0.6051	0.6321
截面数	17	17	17	17

## 3. 出口情况

根据贸易的构成,服务贸易可以分为服务进口和服务出口。表 5 为服务出口的 3 个指标对国民收入追赶的效应:服务出口占贸易总额的比重、服务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以及服务出口中通信服务出口的比重。第(1)、第(2)列结果显示,服务出口占贸易总额比重、服务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对国民收入追赶的效应显著为负,而服务出口中通信服务出口占比的效应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只有高技

术服务出口才能有效促进国民收入追赶。第(4)、第(5)列结果进一步表明,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总出口中服务出口占比对国民收入追赶的效应虽然为负,但不显著。第(6)列表明,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高技术服务出口有助于国民收入追赶。

表5 服务业出口结构与国民收入追赶

解释变量	全部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		
	(1)	(2)	(3)	(4)	(5)	(6)
<i>ExpTrade</i>	-0.1628*** (0.0209)			-0.0317 (0.0350)		
<i>ExpExport</i>	-0.1816*** (0.0209)			-0.0474 (0.0367)		
<i>ExpHigh</i>	0.0344*** (0.0086)			0.0554*** (0.013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988	988	848	416	416	359
$R^2$	0.5772	0.5838	0.5791	0.7289	0.7295	0.7620
截面数	42	42	42	17	17	17

#### 4. 进口情况

表6为服务进口对国民收入追赶的影响。第(1)~(3)列结果表明,贸易总额中服务进口占比和总进口中服务进口占比都不利于国民收入追赶,而高技术服务进口的效应不显著。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总进口中服务进口占比对国民收入追赶的效应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新兴市场国家的服务进口有助于国民收入追赶。

表6 服务进口结构与国民收入追赶

解释变量	全部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		
	(1)	(2)	(3)	(4)	(5)	(6)
<i>ImpTrade</i>	-0.0652** (0.0255)			0.2471*** (0.0472)		
<i>ImpImport</i>	-0.0474* (0.0261)			0.2626*** (0.0472)		
<i>ImpHigh</i>	-0.0075 (0.0183)			0.1055*** (0.028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988	988	960	416	416	408
$R^2$	0.5525	0.5510	0.5475	0.7470	0.7493	0.7352
截面数	42	42	42	17	17	17

#### 5. 稳健性检验

##### (1) 变量替换

表2~6的回归分析中采用PPP法测度国民收入追赶指数,下面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使用图集法测度的国民收入追赶指数,同时还增加了政府消费、

居民消费、城市化率等控制变量。表7的回归结果与表2、表3一致,说明在不同方法下测度的国民收入追赶系数不会影响回归结果。

表7 服务贸易与国民收入追赶:指标重估

解释变量	全部样本		新兴市场国家	
	(1)	(2)	(3)	(4)
<i>SerGdp</i>	-0.4467*** (0.0320)		-0.2171*** (0.0528)	
<i>SerTrade</i>			-0.3935*** (0.044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983	983	412	412
$R^2$	0.6422	0.6000	0.8004	0.7948
截面数	42	42	17	17

#### (2) 内生性讨论

分析中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即国民收入水平越高越可能促进服务贸易。为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服务贸易指标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服务贸易具有序列相关性,即与解释变量高度相关;另一方面,服务贸易滞后项指数比国民收入追赶指数提前一年,满足与被解释变量不相关性。综上,本研究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表8的回归结果与表2、表3基本一致。此外,还使用系统GMM方法重新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具体效应和影响方向与以上结果相似。也就是说,表2~7的回归结果是可信稳健的。

表8 服务贸易与国民收入追赶:工具变量

解释变量	全部样本		新兴市场国家	
	(1)	(2)	(3)	(4)
<i>SerGdp</i>	-0.1602*** (0.0232)		0.0028 (0.0437)	
<i>SerTrade</i>			-0.2106*** (0.031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955	955	404	404
$R^2$	0.5828	0.5762	0.7407	0.7444
截面数	42	42	17	17

#### (3) 机制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生产率提升是服务贸易影响国民收入追赶的重要路径。基于此,把模型(1)重新设定为

$$Catch_{it} = \alpha_0 + t + \beta_0 E_{TFP} + \beta_1 E_{TFP} X_{it} + \alpha_1 X_{it} + \alpha_2 Z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式中： $E_{TFP}$ 为全要素生产率； $\beta_0$ 、 $\beta_1$ 为待估计参数。

表9为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效应，发现TFP对国民收入追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服务贸易占GDP比重和TFP的交叉项表明，全样本中服务贸易没有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国民收入追赶。但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服务贸易占GDP比重通过提升TFP显著地促进了国民收入追赶，这与表3中服务贸易占GDP比重对国民收入追赶的正向效应相对应。同样地，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和TFP交叉项的回归系数虽然不显著，但分别对全样本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效应不同。这与表2、表3的回归结果一致。

表9 生产率的机制作用分析

解释变量	全部样本		新兴市场国家	
	(1)	(2)	(3)	(4)
$E_{TFP}$	0.4931*** (0.0187)	0.4614*** (0.0258)	0.5466*** (0.0341)	0.4979*** (0.0519)
$SerGdp$	0.1001 (0.0629)		-0.1193 (0.1099)	
$E_{TFP}SerGdp$	-0.0015 (0.0060)		0.0271** (0.0119)	
$SerTrade$		0.0447 (0.1247)		-0.1795 (0.2525)
$E_{TFP}SerTrade$		-0.0032 (0.0120)		0.0212 (0.027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988	988	416	416
$R^2$	0.8515	0.8448	0.8882	0.8789
截面数	42	42	17	17

####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 1. 结论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服务业开放对一国国民收入追赶的影响。借鉴Woo提出的收入追赶指数，从服务业开放及开放结构的视角实证分析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研究表明：第一，仅从服务业规模维度的开放未必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更应该重视服务业开放质量和结构；第二，新兴市场国家的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提高对国民收入追赶指数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新兴市场国家提升对高技术服务的进出口比重将有利于促进国民收入追赶指数；第四，服务贸易占GDP比重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国民收入追赶。因此，我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既要在管控风险的前提下重

视扩大服务业开放对国民收入追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促进作用，更要注意优化服务业的开放结构和提高服务业的开放质量，不断提升服务贸易中高技术服务进出口占比，尤其要重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民收入追赶的作用。

##### 2. 政策建议

(1) 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发展，为扩大服务业开放夯实基础

本国的服务业发展如果很弱小，就不可能大规模开放或全面开放。本国服务业体量足够大且质量较高，才有可能更大力度开放服务业，才能抵御服务业开放可能的冲击或风险。我国服务业大而不强，服务业附加值比较低，总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要扭转这种状态，必须从两个方面发力：一是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激励服务业有效竞争，打破服务业管制，释放市场主体活力，降低相关交易成本，提高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二是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服务业创新发展的关键作用，力争通过创新发展提高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企业数量、就业数量、线上市场配置资源数量几乎与传统经济并驾齐驱。数字经济的发展极大促进了服务业网络化、平台化和智能化。抓住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机遇，不断创新服务业发展的新领域、新业态和新模式。数字经济推动了服务业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但数字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不容忽视，尤其是城乡数字鸿沟等问题比较突出。未来，我们要更加关注数字经济的普惠发展，合理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加大对落后地区和特定人群定向财政扶持的力度，让数字经济阳光普照城乡大地<sup>[24]</sup>。重视传统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就业的结构性冲击，遏制数字平台垄断行为，明确平台经济发展的“红绿灯”，按照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加强平台经济的监管和治理，力求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两不误<sup>[25]</sup>。

(2) 积极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提高服务业开放质量

服务业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受到国内市场发育程度和政策设计影响，也受到复杂的国际环境影响。制定服务业开放战略和政策，必须全面权衡其收益、成本和潜在风险，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因素放在第一位，充分估量社会和民众的

承受能力,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遵循“两步走”的时序安排。第一步,放松对服务市场的直接管制,基本开放服务产品市场,大幅降低服务产品的非关税壁垒;加快开放服务要素市场,加快清理无形产品贸易壁垒和投资进入壁垒;高水平建设自贸试验区,营造更加开放、更加便利化的投资经营环境,全面推进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第二步,更大幅度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除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服务行业,原则上不设准入限制,金融保险、商务服务、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的前提下,要按照国民待遇原则积极有序开放。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营造友善宽松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国际资本进入中国服务业市场。同时,鼓励中国服务业企业“走出去”,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服务业市场竞争,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形成世界品牌的服务业企业集团<sup>[26]</sup>。

### (3) 优化服务业开放结构,防范服务业开放的潜在风险

我国有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发展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有很大优势。但是,我们不可能长期依靠输出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而是要致力于优化服务业出口结构和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力争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获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同时,要注重优化服务业进口结构,主要是增加高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进口,通过更多引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来激活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此外,要加强对进口先进技术的学习转化能力,推动引进的知识和密集型服务业与国内现代制造业深度融合,充分发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提升现代制造业竞争力的积极作用,夯实国民收入追赶的产业基础<sup>[22]</sup>。实施服务业开放战略,必须把控好服务业开放的潜在风险,做好服务业开放的风险监管与精准应对。服务业门类众多,有些领域比较敏感,事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比如金融、电信等重要领域的扩大开放,必须提前做好潜在风险评估和有效监管,避免出现影响国家安全和稳定的事件发生。

### (4) 加快发展服务贸易,优化服务贸易行业结构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服务业进出口

总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服务贸易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传统服务贸易比重明显下降,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快速上升。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服务业管制的逐渐放松,全球服务贸易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机遇。我们正在致力于建设贸易强国,就必须加快弥补服务贸易这块短板,不断壮大服务贸易规模、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和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方式。一是加强管理和有效协调。服务贸易的本质是服务业进出口,但服务产业分属各个行业管理部门,商务部门虽然是服务贸易综合协调部门,但从这几年的运行实践看,协调难度很大,服务贸易发展难以形成合力,各自为政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要强化服务贸易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加强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二是逐渐降低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推动取消或放宽对服务贸易的限制措施,为扩大服务业开放奠定制度基础,引导服务业企业更大范围更有活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三是优化服务贸易行业结构。对旅游、运输和劳务工程承包等传统服务贸易,我们依然要高度重视,不能轻易丢掉比较优势,但更要重视对传统贸易数字化改造升级,寻找新发展动能,着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提高服务业进出口的技术知识含量,增强服务业出口附加值。还要注重培育特色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比如:推进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健康发展、加快发展教育服务贸易等。

### (5) 构建更加有利于扩大服务业开放的营商环境

服务业外商投资者进入中国,中国服务业企业“走出去”,是服务全球化的必然选择,我们要坚持服务业双向开放和对等开放、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发展。服务要素能否规范有序流动,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构建国际化、法制化、规范化和透明化的营商规则。优化服务业发展的营商环境,是服务业吸引外资的基本条件,是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和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服务业创新发展和对外开放,不可避免涉及现有企业的既得利益和创新组织者的利益冲突,这就需要我们适时引导社会氛围,提高政府服务效能,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签证便利化,健全境外专业人才流动机制,营造有利于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氛围与环境。凡国家法律法规未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要向外资和社会资本开放,并实行内外资、内外地企业同等待



遇,形成服务业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当前,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正在蓬勃发展,我们要全力构建与我国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相适应、与我国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数字营商环境,确保服务业创新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 参考文献:

- [1] 江小涓,罗立彬. 网络时代的服务全球化——新引擎、加速度和大国竞争力[J]. 中国社会科学,2019(2): 68-91.
- [2] 夏杰长,肖宇. 以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壮大实体经济[J]. 中国流通经济,2022,36(3):3-13.
- [3] 张来明. 中等收入国家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基本做法与思考[J]. 管理世界,2021,37(2):1-11.
- [4] 夏杰长,肖宇,孙盼盼. 以服务业扩大开放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理论逻辑与政策思路[J]. 国际贸易,2020(6):4-13.
- [5] 傅纛捷. 中等收入国家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D]. 长春:吉林大学,2015.
- [6] WOO W T. China meets the middle-income trap: the large potholes in the road to catching-up[J].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2012, 10(4): 313-336.
- [7] 许宪春,吕峰.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建立、改革和发展研究[J]. 经济研究,2018,53(8):4-19.
- [8] 孙琦峰. 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路径研究[D].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5.
- [9] 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 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
- [10] 张德荣.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J]. 经济研究,2013,48(9):17-29.
- [11] 高杰,何平,张锐.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述评[J]. 经济学动态,2012(3):83-89.
- [12] 赵秋运,林志帆. “欲速则不达”:金融抑制、产业结构扭曲与“中等收入陷阱”[J]. 经济评论,2015(3): 17-30.
- [13] 郭金兴,包彤,曹亚明. 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J]. 江淮论坛,2020(2):92-102.
- [14] 杨高举,黄先海. 中国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吗?[J]. 管理世界,2014(5):5-22.
- [15] 王效云. 拉美国家的发展困境与出路[D].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20.
- [16] 王丽莉,文一. 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基于

工业化路径的跨国比较[J]. 经济评论,2017(3):31-69.

- [17] 姜文辉. 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经验与教训[J]. 亚太经济,2016(6):92-98.
- [18] 张建华,程文. 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 中国社会科学,2019(3):39-61.
- [19] 任皓,周绍杰,胡鞍钢.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增长效应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17(8): 34-45.
- [20] 夏杰长,肖宇. 构建中国服务贸易持续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J]. 社会科学战线,2018(3):56-64.
- [21] 海松. 我国技术贸易影响技术进步的理论与实证检验[D].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16.
- [22] 徐紫嫣,姚战琪,夏杰长. 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区域创新中介效应检验[J]. 经济纵横,2021(9):43-52.
- [23] 代法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经验和对策——基于44个国家的跨国实证分析[J]. 财经研究,2014, 40(2):54-66.
- [24] 夏杰长,姚战琪,徐紫嫣. 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J]. 社会科学战线,2021(6):67-78.
- [25] 李勇坚,夏杰长. 数字经济背景下超级平台双轮垄断的潜在风险与防范策略[J]. 改革,2020(8):58-67.
- [26] 夏杰长,姚战琪. 中国服务业开放40年——渐进历程、开放度评估和经验总结[J]. 财经问题研究,2018(4): 3-14.

(收稿日期:2021-09-10 编辑:张志琴)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threshold, and the inhibiting effect decreases after the threshold is crossed.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rate in China's chemical industry is still at the left end of the threshold, and the inhibiting effect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 is still at a strong stage. To improve th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chemical enterprises in the future, we need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system, raise the awareness of enterprises themselves and develop corresponding incentive supporting policies.

**Key word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 causal mediation effect

**Optimal Financial Spatial 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ed Growth/ZHOU Li, et al**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economic data of 30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9, this paper uses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spatial 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four sub-dimensions of financial ratio, financial vitality, financial efficiency and financial dens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nancial structure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effect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n China, and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ffected not only by the financial structure of the region, but also by the financial structure of neighboring regions. From the direct effect of financial structur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financial efficienc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while financial density inhibits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and neighboring areas. Financial ratio and financial vitality significantly driv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urrounding provinces. And the economic influence of financial spatial structure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s different. Therefore, we should continue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and optimize the matching degree of financial spatial structure and re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xert the policy guidance function of "enabling government" and the finan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function of "efficient market". In addition,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differentiated financi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based on local industrial endowments.

**Key words:** spatial financial structure; spatial financial layou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ion; spatial Durbin model

**Service Industry Opening-up, National Income Catch-up and Cross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XU Ziyang, et al**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national income catch-up and cross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rvice industry opening-up.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Firstly, it may not promote the catch-up of national income under the high openness of service industry. Secondly, the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service trade in total trade in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come catch-up index. Thirdly,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imports and exports of high-tech services in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will help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income catch-up index. Lastly, the proportion of service trade in GDP promotes the catch-up of national income by improv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Therefore, as an emerging market country,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positive role of expanding the opening-up of service industry in catching up the national income and cross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What's more, China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optimizing the opening structure of service industry, improving the opening quality of service industry, improving the import and export proportion of high-tech services in service trade,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FP in promoting national income catch-up.

**Key words:** service industry opening-up; national income catch-up; middle-income trap;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nd Changes of the Late Supporting Policies for Reservoir Resettlement/CHEN Shaojun, et al**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China's decades of late supporting policies for reservoir resettlement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storation of resettlers' livelihood and shared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duced many unexpected consequences in pract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unty integr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it ha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practice forms and deep-seated reasons of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nd build the transformation framework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late supporting policies.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reservoir resettlement supporting policies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It is found that the practice forms mainly include: the unscientific verification method of resettlers status leads to a surge in the number of resettlers, the resettler status inhibits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resettlement areas, the continuous national supporting induces the risk of moral crisis for resettlers, the continuous supporting causes double deprivation to the aborigines, the local resettlement agencies, based on departmentalism, hope that the resettlers will exist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top-level designers face a dilemma when formulating the late resettlement supporting policy.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and new situation, based on the trinity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upport subjects, support methods and support resourc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of the late resettlement supporting policy in order to provid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the late resettlement supporting policy in the next stage. At the same time, the good practice and system design of the late support for reservoir resettlement can als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late support of relocation being implemented in China.

**Key words:** reservoir resettlement; late supporting policy;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policy shift; integrated development

**History, Deficiency an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Health Management Policy/LI Zhizhuo**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